

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

——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

何 德 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南迁北族出身者籍贯,实行门阀制度,鼓励其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通婚,促成北魏后期“胡人士族”的形成,治史者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①。孝文迁洛,主旨在于文治,鲜卑族上层的士族化,亦不过是其文治政策的一种手段,而鲜卑族上层的文士化,更是所谓“胡人士族”得以成立的关键。北魏迁洛以后,鲜卑族上层文化面貌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文治,“知书”是对鲜卑族人特别是其上层的基本要求,但迁洛之初,鲜卑族人对此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魏书》卷21上《广陵王元羽传》说,孝文下令迁洛后返回平城:

高祖引陆贲、元赞等于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悦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

既迁洛阳,随着门阀制度的实施及官制改革重文轻武,“北人何用知书”的言论因而消歇,崇尚文化在迁洛的鲜卑贵族中蔚为风气,这在邙洛出土的鲜卑贵族的墓志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延昌三年《元颢志》^②:

生而恢岸,幼则奇伟。恭孝之心,睦睦于韶年;忠亮之操,蹇蹇于弱岁。韵宇神凝,雅度清简,倾衿慕道,殷勤引德,俊士游于高门,英彦翔于云馆。若夫优游典谟之中,纵容史籍之表,才逸自天,制每惊绝。弱冠有声,拜奉车都尉,……又为步兵校尉,并非其好。君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绿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氏而同侣,古由今也,何以别诸!……穷达晏如,臧否若一,志散丘园,心游濠木。

《志》称为拓跋焘太子拓跋晃之子、阳平王某第六子，检《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成传下附有子颺、衍、钦三人，无元颺其人。据《志》，他卒于延昌三年(514)，年45，则其志学之年，当太和中后期，而招朋纳友，以琴书自娱，则在迁洛之后。

元颺事迹不见于史传，其兄元钦字思若，“少好学，早有令誉，时人语曰：‘皇宗略略，寿安、思若’”。建义元年《元钦志》对元钦文才说得更为详细：“三坟五典之秘，甲岁已通；九流七略之文，绮年尽学。齿在童稚，雅为献文所矜，未及弱冠，偏蒙高祖流爱。出入之际，与众不同，宴会之际，每见优礼。……至于秋台引月，春帐来风，琴吐新声，淥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岩里四公，曷云能上。”据《魏书》卷19上《汝阴王天赐传附传》，寿安名修义，乃元颺从兄弟辈，“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孝昌二年《元寿安志》则称寿安为名，修义为字，与《魏书》相反。《志》称寿安“孝以事亲，因心自远，友于兄弟，不肃而成。弱而好学，师佚功倍，雅善斯文，率由绮发，自是藉甚之声，遐迩属望；珽瑚之器，朝野归心。寿安、元钦二人以文名，他们好学而受到称颂，显然与太和时期提倡文治的大背景有关，从元钦、元修义好学有令誉，可以判断《元颺志》所说不虚。但此三人均不见有何著述。迁洛以后，元氏后进以文名者的水平，无疑远远超过他们之上。《魏书》卷18《临淮王谭传元彧附传》说：

彧少有才学，时誉甚美。侍中崔光见彧，退而谓人曰：“黑头三公，当此人也。”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楚尽〕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彧姿制闲裕，吐发流靡。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所著文藻虽多亡失，犹有传于世者。

安丰王元延明附传见于《魏书》卷20《安丰王猛传附传》，传称他“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于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太昌元年《元延明志》对其文才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志》称：

自有大志，少耽文雅，肆情驰骋，锐思贯穿，强于记录，抑亦天启，必诵全碑，终识半面。故河间所不闻，陈农所未采，莫不祛疑辨惑，极奥穷微，雕虫小艺，譬诸绮毅，颇曾留意，入室升堂。实使季长谢其诗书，伯喈归其文籍。……又监校御书，时明皇则天，留心古学，以台阁文字，讹伪尚繁，民间遗逸，第录未谨。公以向、歆之博物，固雠校之所归，杀青自理，简漆斯正。……既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明堂辟雍，皆所定制，朝仪国典，质而后行，加以崖岸重深，风流旷远，如彼

龙门，迢然罕入。惟与任城王澄、中山王熙、东平王略、竹林为志，艺尚相懽。故太傅崔光、太常刘芳，虽春秋异时，亦雅相推揖。

元熙事迹见于《魏书》卷19下《南安王桢传附元熙传》，传称他“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然轻躁浮动。……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与袁翻、李琰、李神儒、王诵、裴敬宪等“才学之士”结为“知友”。孝昌元年《元熙志》志亦称：“幼而岐嶷，操尚不群，好学博通，善言理义，文藻富贍，雅有俊才。……性不偶时，凝贞独秀。得其人，重之如山；非其意也，忽之如草。是以门无杂宾，冰清玉洁，有若月皎云间，松茂孤岭。见者羨其高风，望者人情景慕。”元熙弟元略亦以才学知名。《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追先寺条”：元略在元熙至江左，“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贍，甚敬重之。谓曰：‘洛中如王者几人？’略对曰：‘臣在本朝，承乏撮官，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鸳鸾接翼，杞梓成荫。如臣之比，赵咨所云：车载斗量，不可尽数。’元略能随口引用韦曜《吴书》所记赵咨对魏文帝语以答，说明他“文学优贍”虽不见于《魏书》本传，但并非虚语。

元彧、元延明及元熙三人是北魏洛阳时代皇族“博古文学”的代表。而墓志中关于迁洛之后宗室人物好学而不见于史传记录的情形还有很多。神龟二年《元祐墓志》：

高宗文成帝之孙，太保齐郡顺王之世子……又道锐志儒门，游心文苑，访忘食，徙义遗忧。虽甄城之好士，平台之遗爱，无以过也。

正光元年《元孟辉志》：

太祖平文皇帝高凉王七世孙……永平之年，解巾给事中，时始八岁矣。有诏入学，听不朝。直年七丧亲，哀毁过礼，十三亟罚，几致灭性。兄弟少孤，善相鞠育，友于之显，遐迹所闻。一员东省十有余年，朝廷以肆业不转。君以乐道不迁，左琴右书，逍遥自得。

正光四年《元秀志》称：

君禀黄中之逸气，怀万顷之渊量，器宇深华，风尚虚远，才见通洽。故早树声徽，幼播令誉。好读书，爱文义，学该图纬，博观简牒，既精《书》、《易》，尤善礼传，隳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藪，虽伯业不倦，宣光纵横，无以尚也。

正光四年《元斌志》：

恭宗后，京兆王孙，元润子。……虽名拘朝员，而心棲事外，恒角中私圃，偃卧园林，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性简贵，慎交游，门察杂游，庭盈卉木，虽山阳之相知少，颖阴之莫逆希，以斯准古，千载共情也。

正光六年《元茂志》：

恭宗后，乐陵密王第三子…君性好俭素，□□□平，出入黔宇，去来踈苑，颇复琴诗拘意，未尝荣禄□心。或门谒八俊，日洞千数，又家无一帛，书有万筐。

孝昌元年《元焕志》：

献文后，赵郡王孙，相州刺史之子。……去彼所天，来纂大国……又爱诗悦礼，不舍斯须，好文玩武，无废朝夕，味道入玄，精若垂书，置觞出馆，懽同林下。故皎皎之韵，高迈群王，斌斌之称，远闻圣上。

武泰元年《元举志》：

字景升……皦而小学，师心功倍，冥讯迅捷，卓尔殊佚。坟经于是乎宝轴，百家由此兮金箱。洞兼释氏，各练五明，六书八体，书妙超群，勾章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性，左右琴诗，故潜肆衡门，声播霄岳。

武泰元年《元暉志》：

王孝情天至，友爱特深，悦善好名，宽仁容众。学涉坟史，雅好诗文，草隶之工，迈于钟、索。

建义元年《元悌志》：

博览文史，学冠书林，妙善音艺，尤好八体。器寓淹凝，风韵闲远，丽藻云浮，高谈响应。信可两尧年之一足，九汉世之八龙，望紫烟以腾骧，陵清风而鸾翥。故能异于公族，独出群辈者矣。

建义元年《元劭志》：

清河文献王第二子也。……王孝乎天纵，忠实化远，闾庭睦睦，无可间之言；朝廷侃侃，有匪躬之誉。赋山詠水，辞爱三春之光，谏丧褒往，文棲九秋之色。至于西园命友，东阁延宾，怀道盈阶，专经满席，临风释卷，步月弦琴。目丽五行，指□三调，布素之怀必尽，风流之貌悠然。

建义元年《元彝志》：

学年标乎令问，冠岁备以成德。熙平之始，王犹在佩觿之辰，孝明皇帝春秋富冲，敦上庠之学，广延宗英，搜扬俊义，……入为侍书。……性乐闲静，不趣荣利，爱黄老之术，尚恬素之志，清思参玄，高谈自远，宾延雅胜，交远游杂。

建议元年《元顺志》：

字子和。……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擔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虽复孙弘居相，王修处官，曷以过也。

建议元年《元湛志》：

爱山水，玩园池，奇花异果，莫不集之。嘉辰节庆，光风罔月，必延王孙，命公子，曲宴竹林，赋诗畅志。性笃学，元好文藻；善笔迹，偏长诗咏。祖孝武，爱谢庄。博览经史，朋旧名之书海。

建议元年《元恩志》：

君自少及长，典籍是务，禀性纯和，久而弥亮。

建议元年《元天穆志》：

神质自成，孤贞特秀，八素九丘之理，靡不洞其幽源；三坟五典之书，故以极其宗致。

建议元年《元子正志》：

自始服青衿，爰启绋帙，好问不休，思经无怠。遂能搜今阅古，博览群书，穷玄尽微，义该众妙。谅以迈迹中山，超踪北海矣。加以雅好文章，尤爱宾客，属辞摘藻，怡情无倦，礼贤接士，终宴忘疲，致邹、马之徒，怀东阁而并至；徐、陈之党，慕西园以来游。于是声高海内，誉驰天下。

太昌元年《元袭志》：

字子绪，……君禀和气象，钟美川岳，廉贞孝友，因心自得。清风峻节，秉襟独远，不假色于朱蓝，宁资深于羽括。错综古今，贯穿百氏，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纂思缜合，摘文锦烂，信足方驾应刘，连横潘左。又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

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辩类县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

太昌元年《元文志》：

献文帝曾孙，文穆皇帝孙……生而奇骨无双，孩而日新月就，五岁诵论、孝，声韵清辩，以为有祖之风焉，孝庄帝特加宠爱。

永熙二年《元赞远志》

父文王，才藻富丽，一代文宗。……性开达，好施与，不事产业，道素自居，虚己待贤，倾身下士。宾客辐凑，冠盖成阴。绸缪赏会，留连琴酒。风韵恢爽，与青松等峻；逸气高奇，共白云俱远。不持小节，有倜傥之才，虽鸿翼未舒，固以远大许之。年渐成立，志闲丘壑，遂负杖入白公台山，下帷潜读。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览；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风流间起，谈论锋出，时观鱼鸟以咏怀，望山川而卒岁。

上面所引均为元氏宗室人物的墓志，与元氏人物相比，其他鲜卑贵族墓志很少，但从不多的墓志中亦可见到他们好文情况的描述。如熙平元年《吐谷浑玑志》称：“君处武怀文，博畅群籍，志录经史，……善文艺，爱琴书，系竹声席，超然独悟。”正光二年《穆纂志》：“君又好文而能武。文随风举，武逐云奔。若乃锋谈电飞，兴连云水，皆率然巧妙，辞旨攸攸。先觉之士，盛以为王佐之才。”普泰元年《穆绍志》说：“风情简旷，伏膺雅道，敦好经术，钻六艺之膏腴，游文章之苑囿。由是风流藉甚，朝野倾属。”

墓志内容当然不可尽信，如《魏书》卷27《穆崇传穆绍附传》说穆绍“无他才能，而资性方重，罕接宾客”，与《穆绍志》所说相去甚远，但这至少可以证明，北魏后期，以文化水平高低为衡量人物高下已成风气。《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孝文帝弟元雍在明帝时为灵太后所信重，执政，但“识怀短浅，又无学术，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有无“学术”确实是当时评判人才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北魏迁洛以前，出于培养鲜卑族文化人才及提高鲜卑贵族统治能力的考虑，较为重视官方学校建设，太学、国子学（后改称中书学）先后建立，冯太后执政时，于州郡遍设立学，并设皇宗学专门教育皇室子弟。孝文帝迁洛，对京师学校亦作了相应的规划，但官方学校一直未能进行实际的教学活动。《魏书·儒林传序》说：

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靡以好爵，动貽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

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孝文帝下诏于洛阳设立各级学校，宣武帝“复诏立国学”，但“黉宇未立”，神龟中复“将立国学”，而“仍复停寝”，均反映了迁洛后新都洛阳官方学校未能设立的事实。同书卷54《李崇传》记其于灵太后时上书言事，提及学校时，称孝文帝时虽有学校规划，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而宣武帝“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速为山，还停一匮”，所以“皇迁中县，垂二十祀”，但“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研究者或因迁洛后官方学校不立，遂认为孝文帝迁洛汉化与文治的初衷并未实现，但明帝之时“文雅大盛”^⑥，以及鲜卑族上层文化进步确为事实，他们接受文化教育，当别有途径。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⑦而家族教育除了直系亲属对下一代的教育外，家族出资设立学馆，延师教授，亦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北齐书》卷34《杨愔传》：

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学庭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暉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顾谓宾客曰：“此儿恬裕，有我家风。”宅内有茂竹，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盛饌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

这是十六国北朝世家大族家族内教育的典型史料，鲜卑贵族士族化以后，亦受其影响。《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成传元钦附传》说：“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渐，于是待客稍厚。”温子升初“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故诣渊谢之。景曰：‘顷见温生。’渊怪问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渊由是稍知之。”^⑧延请人教“奴子”识写文字，自家子弟的教育当更受重视。任城王元澄子元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⑨大儒刘兰兼通《五经》，“又明阴阳，博物多识，为儒者所宗”。“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⑩元熙、元诱、元略兄弟在孝明帝时以才学知名，其最终的学养虽非刘兰传授所致，但启蒙教育无疑有赖于学馆。鲜卑贵族采用汉族世家大族的方式教育子弟，也是鲜卑贵族世族大族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鲜卑族上层文士化的基础。

迁都洛阳后，鲜卑族上层的文士化倾向，不仅表现在鲜卑贵族进行家族教育，使子弟识文断字，从而免“面墙”之讥，而且表现在接受南方上流社会学风的影响，崇尚文学、老庄玄学，并热衷于士林间的文学交往与相聚清谈。

《北史》卷 83《文苑传序》说：“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魏书》卷 85《文苑传序》亦称：“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蹕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综合二者，是说孝文帝在太和时期开创了一种崇尚文学的风气。《魏书·孝文帝纪下》对孝文帝学养总的叙述中，亦可看出孝文帝学问的特征：“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史传百家，无不该览。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重博览而不守一经，谈庄老而尚文学，为南朝士人的常态，对于北方来说，却是刚刚开始“新风”，孝文帝对此“新风”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

《魏书》中关于孝文帝以崇尚诗文的事例甚多。卷 19 中《任城王元澄传》说元澄“音韵高雅，风仪秀逸”，被南齐来使赞为“以文见美”，“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时犹在迁洛之前。迁洛之后，“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后元澄从孝文南征，因疾还洛阳，孝文帝“赋诗而别”。传又称：

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虎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曰：“此所谓‘鱼在在藻，有颂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于初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闲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义，此盖取夫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后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虎，西曰游凯虎。此堂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于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高祖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卷 21 下《彭城王勰传》说：

高祖与侍臣升金墉城，顾见堂后梧桐、竹曰：“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今梧桐、竹并茂，讵能降凤乎？”勰对曰：“凤皇应德而来，岂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凤皇来仪。周之兴也，鸞鸞鸣于岐山。未闻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肃然，及将末也，觞情始畅，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

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慕容群臣应诏诗。至颺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颺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颺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颺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卷 56《郑羲传子道昭附传》说：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颺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晕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从上引史料说明，孝文帝迁洛之后，常与宗室人物及侍臣酒宴唱和，引经据典，如文人雅聚。《魏书》卷 65《邢峦传》说：“峦少而好学，负帙寻师，家贫厉节，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美须髯，姿貌甚伟。”为孝文帝“知赏”，后“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因邢峦“才清”即才能更高而让其主持秀才策试，《魏书·文苑传》所列北魏后期文学人物，不少即参与秀才策试并获高第，表明秀才策试重文章已是当时风气。孝文以邢峦“才清”而特命他“策秀”，更说明孝文帝心目中，文学才是主要的学问，有文学才能的人士尤受重视。崔光（字孝伯）十七岁时从青州入平城，“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后来成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领袖。“甚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⑧孝文帝又曾对韩显宗及程灵虬说：“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⑨王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他从南齐北奔，孝文帝特加垂青，身后以为辅政大臣之一，不仅因为要利用他对引进南方制度，亦由于他“辞义敏切”、“音韵雅畅”而“深会帝旨”^⑩，与偏爱文学清谈的孝文帝内心契合。其弟元彭城王元颺“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孝文曾以曹丕、曹植兄弟相比拟，表示弃二曹“才名相忌”而当以“道德相亲”^⑪。诸弟之中，特受孝文帝信重，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应是原因之一。

儒学重在经典，文学讲求博通；儒学重传承，而文学贵创造。北魏洛阳时代文学兴起，从学业精进上讲，下帷苦读，博览多闻，友朋切磋，远比学校师授更为重要。前引诸方墓志之文，所述墓主才学，博览便是重要内容。《元怱志》所谓：“学通诸经，强识博闻，一见不忘。百氏无遗，群言毕览”；《元子正志》称其“遂能搜今阅古，博览群书，穷玄尽微，义该众妙”；《元延明志》称“自有大志，少耽文雅，肆情驰骋，锐思贯穿，强于记录，抑亦天启，必诵全碑，终识半面。故河间所不闻，陈农所未采，莫不祛疑辨惑，极奥穷微，雕虫小艺，譬诸绮縠，颇曾留意，入室

升堂。实使季长谢其诗书，伯喈归其文籍。”《元袭志》谓其“错综古今，贯穿百氏，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元赞远志》谓其“年渐成立，志闲丘壑，遂负帙入白公台山，下帷潜读。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览”。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儒学教育的官方学校便可有可无，东晋南朝官学不立，但文学、史学等成就斐然，即为明证。

书籍是广收博览的前提。元延明“鸠集图籍万有余卷”，前引《元茂志》称他“家无一帛，书有万篋”；《元顺志》谓其“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担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北方历经十六国以来动乱，书籍本少，南朝是孝文帝汉化时代书籍的重要来源。正光元年《李璧墓志》说：“昔晋人失驭，群书南徙，魏因沙乡，文风北缺。高祖孝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观书亡落，恨阅不周。与伪连和，规借完典。而齐主昏迷，孤违天意。为中书郎王融……启称在朝，宜借副书。”《南齐书》卷47《王融传》亦称北魏曾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上书主张给与，使“经典远被，诗史北流”，但“事竟不行”。《隋书·经籍志总序》说：“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或与事实有出入。但无论如何，南方文籍多于北方，北魏迁都后，洛阳文学之风兴起，必然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前述《王融传》称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房景高、宋弁出使南齐，王融奉命接待，房景高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其时犹未迁都，南方文人一篇新作，竟已被北方知晓。迁洛之后，为保证洛阳的安全，孝文常亲率军南伐，南北一度交恶，但梁朝建立后，南北通使频繁，说南方“四境之内，家有文史”^⑧，虽不无夸张，但书籍与文人新作北传无疑更为普遍。元暉“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科录》当为便于作文用典编制的类书，其内容包含晋、宋，应广引南方书籍。元坦“傲凶粗”，其从叔元延明指责他说：“汝凶悖性与身而长，昔有宋东海王祗志性凡劣，时人号曰‘驴王’。我熟观汝所作，亦恐不免驴号。”^⑨刘宋典故元延明信手拈来，无疑是读南方史书的结果。《魏书·文苑·温子升传》称其正光末因事“无复宦情，闭门读书，厉精不已”。其文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当亦是揣摩南方文人诗文所致的缘故。梁魏通和，南方书籍与文人作品大量北传，北方上流社会加以揣摩学习而精进，应是孝文帝对文学虽大力提倡，但要到孝明帝时方“文雅大盛”的重要原因。《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追先寺”条说元略“从容闲雅，本自天资，出南入北，转复高迈。言论动止，朝野师模。”元略虽本有文才，及其因事南奔梁朝，与南方文士周旋，当颇有精进，所以北返洛阳后，人以为“师模”，至少这反映了当时洛阳文人崇尚南方文化的心态^⑩。

与文学一并兴起的是南方文人生活方式，如崇尚自然、相聚清谈、弹琴饮酒、喜爱书法，乃至生活上放达，亦在洛阳上流社会漫延。《魏书》记孝文帝与侍臣宴聚赋诗场所，名为流化渠、流化池、清徽堂、步元庀，游凯庀，有池、渠及桐竹芳林，业已显示出这位热爱文学的皇帝生活方式上接近南方文士的情调。这种生活情调在洛阳文风大盛后更进一步被发扬光大。前引《元颺志》谓其不喜作官，“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绿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氏而同侣，古由今也，何以别诸！……穷达晏如，臧否若一，志散丘园，心游濠木。”《元斌志》称：“虽名拘朝员，而心悽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园林，望秋月而赋篇，临

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性简贵，慎交游，门寮杂游，庭盈卉木，虽山阳之相知少，颖阴之莫逆希，以斯准古，千载共情也。”《元湛志》：“爱山水，玩园池，奇花异果，莫不集之。嘉辰节庆，光风罔月，必延王孙，命公子，曲宴竹林，赋诗畅志。”元熙临死写信给“知故”，感叹说：“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都反映了鲜卑族上层文士化后的生活情趣。“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⑩文士与儒者原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人，文学的兴起必然造成北方上层社会行为方式的变化。《魏书·文苑·温子升传》说：“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文人生活上重感性与个性，作为北方文学新人的模仿对象南方士族文人亦多不拘行检，文学的特质加上北方新文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的共同作用，便形成杨愔所述的社会现象。

《洛阳伽蓝记》中有不少私家园林的描述，论者指其与南方文人私家园林在规模与色彩上呈现差异^⑪，实如《魏书·文苑传序》所说，文学虽兴，但“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对于成熟的南方上流文化的学习与模仿，并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魏书·文苑·邢昕传》说：“自孝昌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经孝文帝提倡、受南方上层社会的影响，洛阳时代文学兴起、鲜卑族上层表现出来的文士化趋势，均是在北魏洛阳时代相对安定时期产生的现象，随着北魏政治的动荡，这一过程因而一度中止。

注 释：

- ① 参刘驰《北朝胡人士族的形成及其影响》，收于氏著《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年版。
- ② 本文所引墓志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标点不尽从，并参考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附图版校正有关墓志文字，不一一说明。
- ③ 《魏书·文苑传序》说：“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北史》卷 43《邢昺传邢劭附传》亦说：“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劭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
-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7 页。
- ⑤ 《魏书》卷 85《文苑·温子升传》。
- ⑥ 《魏书》卷 19 中《元澄传元顺附传》。
- ⑦ 《魏书》卷 84《儒林·刘兰传》。
- ⑧ 《魏书》卷 67《崔光传》。
- ⑨ 《魏书》卷 60《韩麒麟传子显宗附传》。曹道衡先生认为崔光出自平齐民，本习于南方文化，这是他在太和及洛阳时期以文学知名的原因。见氏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3—205 页。
- ⑩ 《魏书》卷 63《王肃传》。
- ⑪ 《魏书》卷 21 下《彭城王元勰传》。
- ⑫ 《隋书》卷 32《经籍志序》。
- ⑬ 《魏书》卷 21 上《元禧传元坦附传》。
- ⑭ 参唐长孺先生《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收于《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⑮ 《三国志》卷 21《王粲传》所载曹丕《与吴质书》。

⑯ 见吴功正《六朝园林》，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2—198 页。

（附记：本文属于 2001 年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南北朝迄唐安史之乱前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 101160542）